

三星堆



贰

●《探索·发现》栏目编

○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一○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二○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三
堆消失与复活五○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六○濮阳星图之谜○北京人头盖骨之谜
谜(下)○古车马(上)○古车马(下)○西沙水下考古
○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三○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四○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五
○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六○濮阳星图之谜○北京人头盖骨之谜
○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五○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六○濮阳星图之谜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失落的文明



贰

探索·发现·栏目·编辑·中国考古学出版社

○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一○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二○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三○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四○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五○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六○濮阳星图之谜○北京人头盖骨之谜(上)○北京人头盖骨之谜(下)○古车马(上)○古车马(下)○西沙水下考古○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一○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二○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三○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四○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五○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六○濮阳星图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中国. 2 / 王新建等编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06-7260-9

I. 考... II. 王... III. 文物—考古—研究—中国 IV. K87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6148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07781

营销: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4066441

责任编辑: 裴海燕 yanyanpei@163.com

书籍装帧: **zhengmei 正美** 魏征/李莉
书籍装帧设计部 010-64003130 zhengmeibj@126.com

印刷: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0

字数: 230千字

版次: 2007年2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7年2月北京第一次

印数: 1-10000册

定价: 25.00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35821



目录 Contents

001-012

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一）

013-022

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二）

023-034

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三）

035-046

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四）

047-056

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五）

057-066

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六）

067-082

濮阳星图之谜





目录 Contents

083-096

北京人头盖骨之谜（上）

097-108

北京人头盖骨之谜（下）

109-122

古车马（上）

123-134

古车马（下）

135-150

西沙水下考古



考古中国

三星堆·消失与复活

(一)



我们时常渴望与远
去的人们进行对话，因为
未知的历史缺乏记载，费
解的谜语没有答案，古老
的故事已经失传……



三星堆·消失与复活

1929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农人燕青宝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宝藏。他们不做声张，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宝器收进家里。燕家所获得的是一大批玉石器，总数约400件。时隔不久，燕青宝的父亲燕道诚将这批玉石器的一部分送给了亲戚朋友，另一部分则存在家中作为镇宅之宝。这以后，燕道诚经常拿出几件向乡邻炫耀，引来许多羡慕的眼光。在那一两年间，广汉月亮湾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广汉玉器名声大噪。燕道诚与众多玉器商人所不知的是，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下沉寂着为数更多的千年宝藏。57年后，这些器物的一部分重见天日，时间是1986年。



就在广汉玉器神出鬼没的时候，正在广汉做传教士的英国牧师董宜笃敏锐地觉察到那些玉器非比寻常。1931年春，他从燕道诚手中拿到了几件玉石器，随即送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戴谦和教授。当时，美国人葛维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第一次见到那几件玉石器时，隐约地感到一个重大的机会即将来临。

在中国任教的葛维汉与戴谦和应该对中国殷墟的发掘并不陌生。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李济先生的领导下，对殷墟展开了发掘工作。殷

墟的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至前1050年。考古者发现了一处王陵、一处宫殿群和商王妃妇好的陵墓，另外，还有几处贵族与平民的居室遗址、手工作坊、战车和卜骨的埋葬地。相信中国的考古成绩曾激发过葛维汉的兴趣，同时，在广汉玉器被发现的年代里，国外考古者们的业



绩华西大学博物馆也应该知道。

1929年，俄国考古学家阿尔特米伊·阿特希克霍夫斯基对俄国中世纪城市诺夫哥罗德展开发掘，发现了十多万件古文物，包括700份异乎寻常的“树皮文”文稿。

1931年，美国古典研究学院的考古队在希腊雅典的中心地带开始发掘，发掘者在阿哥拉的中心发现了一座公元前5世纪的神庙。

1932年，卡尔·布列根指导一支美国考古队在特洛伊开始发掘工作。

1933年，波兰人瓦兰提·兹瓦基科在波兰中北部比斯库平发现了一处被水淹没的铁器时代早期的居民遗存。

第二年，也就是在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起一支考古发掘队，并得到当地驻军的配合。他们在月亮湾燕道诚家的院子旁首次进行了发掘工作，从而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

葛维汉仿佛拾到了一把开启神秘之门的钥匙。只是由于运气、经验与条件的限制，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一扇门。一片巨大的远古城市沉寂在地下，那曾经是一座人口以万计的大城。大约3000年前的时候，这座城廓神秘地消失了。至于其消失的原因，直到今天，仍



然是人们探究的话题。

葛维汉、林名均在月亮湾发掘到许多玉石器和陶器残片。那时，他们也许无数次地踩踏过600米以外的一个地方，那个地点埋葬着大量神秘的器物，被揭露的时间却是52年后的事了。

葛维汉在1935年离开华西大学博物馆，回到美国。他之后第5任馆长是四川大学考古系的霍巍博士，时间已经是2003年。



四川大学考古系博士霍巍说：葛维汉本人当时做了很多笔记，这些笔记，在他离任的时候，带回了美国。据我了解现在在一个叫哇啦哇啦的小城市里，还收藏了他带回去的文字性的材料，包括他的一些考察笔记、一些手稿，据说还有相当数量的照片。

葛维汉先生在广汉考古以后的29年里，三星堆田野一片寂静，尽管广汉的玉器依然神出鬼没，却没有来过考古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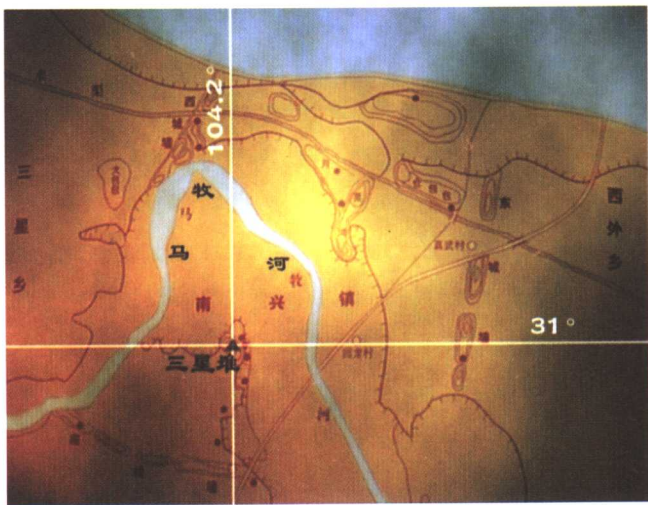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先生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家佑等人来到广汉。他们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3年后，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一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王家佑在燕道诚家里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诚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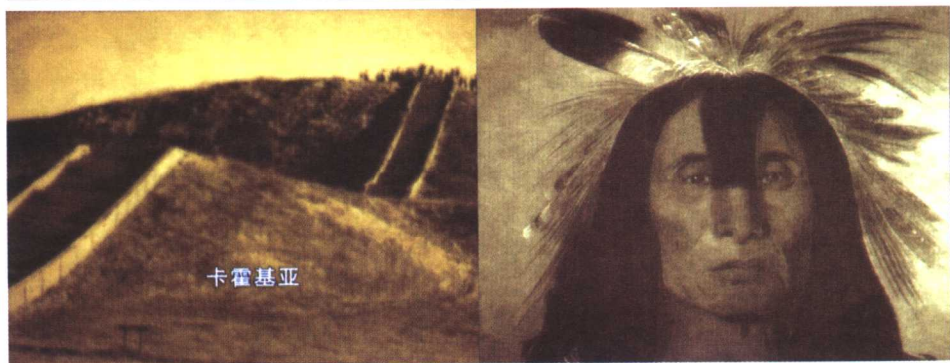
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钺、石壁等文物贡献出来。今天，这些器物分别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和三星堆博物馆珍藏。燕氏第四代人依然居住在从前的老院子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其他农人有所不同的是，燕家的人要经常面对各种来意的访客，次数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又对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做了全面调查。3年后，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大学冯汉骥博士率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和四川省博物馆工作人员来到月亮湾。冯汉骥先生在三星堆的土城遗址上细细观察，一个巨大的城市轮廓隐隐再现。他猜想，这一带会不会是古代蜀国的一处中心都邑呢？冯汉骥博士的想法在23年后得到了证实。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是由三十多个地点组成的长方形遗址群。马牧河的南岸原来有3个大土堆，被当地人称做三星堆。它位于东经104.2度，北纬31度的地方。有关三星堆名字的由来，我们可以理解是当地人世代口传的结果。那么，三星堆的“堆”在四川人的口语中，有人工垒积的意思。我们或许可以把三星堆理解为人工垒积的3座土台。中国古代书籍中就有许



多人工垒积高台的记载，在《山海经》中，就经常提到丘、山、台、坛、墩等。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有关于土建高台的记录，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南部就坐落了许多不同形态的土墩，其中时间久远的一些圆锥体土墩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建造的。凌纯声先生在《美国东南与中国华东的丘墩文化》一书中提出，“丘墩文化”于公元前30世纪左右在中国的华东已经存在，这一文化往南，向淮河长江流域传播，同时传入太平洋中的岛屿，渡过太平洋到达中、南美洲，直到“伍德兰时代”在北美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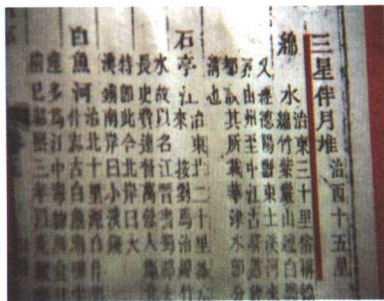


霍普维尔土墩群和阿德纳土墩群一样，在19世纪中被认为是一种覆盖着地域文化的祭祀建筑。在圣路易斯市东部的卡霍基亚大建筑群中，有一座四层台子的平顶土墩，高达33米。有关谁是这些土墩的建造者，属于19世纪最大的思想论争之列。1894年，居鲁士·托马斯对这个问题作了最终结论，即这些土墩是现代印第安人的祖先建造的。

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曾提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假设，他认为这个连续体的范围包括旧大陆和新大陆，其时间至少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他指出，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他们的文化，尤其是美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程度，远远比我们现在从极有限的考古资料中所看到的要高很多。从这个观点可以推想，在两三万年前到一万多年以前，人类通过白令海峡到新大陆，在这个源源不断的过程中，他们具有的文化装备是相当复杂的。在这种程度很高的文化的基础上，后来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就



△



产生了相似的文明社会。

三星堆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貌。仅存的这一处土丘仍然顽强地证明着自己的位置。地方志和古籍文献没有记载垒建这3座高台的原始含义，可能也没有人知道那里面封存着多么巨大的历史信息。



从1970年开始，有人在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那时，正在广汉文化馆当文物干部的敖天照见此情形很是上火。

广汉文化馆文物干部敖天照说：我希望他们尽快来发掘，可是1976年、1977年过去了，还没有动静。我就着急了，我想你们再不来挖，三星堆那个土堆就被砖厂挖完了，太可惜了，那么多的陶片。我当时想，省考古队就跟救火队一样，硬是到了火烧房子才能来呀？又一想，四川那么大，可能他们考古队的人手少。

当时，在省考古所任副队长的赵殿增与四位同事驾驶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一路颠簸来到三星堆。



敖天照先生为古代遗存四处奔走，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考古者发现了龙山时代和距今3000~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的陶片标本。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这一年，是中国的虎年，按照传统的说法，会有许多人成为命运的幸运儿。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显丹说：当时挖掘很热闹，在历史上是挖掘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中了好几十人，加上民工有两百多人的规模，这是很大的挖掘现场了。

当时，四川大学的林向教授与霍威、李勇宪及20名考古专业的学生一同参与发掘。

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林向说：我真正介入是1986年，我带着学生去搞实习，去的时候是3月份，下大雪呢，把积雪扫开了以后画线。一直挖到五六月份菜籽花开了以后又谢了、都结菜籽了、收了油菜籽以后，咱们的工程才完成。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掘了面积1340平方米。可以说是我们四川地区、西南地区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发掘。共发掘了有2.5米深的文化层的堆积，可以划为13层。也就说，从现在一直可以连续到新石器时代，成了成都平原的一个标尺。等于一本书一样的，倒过来了。第一页在底下，最后一页在上面。等于说几千年历史的话，在这个地层里面可以看出来了。

在考古现场，考古者小心地揭示着表土下面的蛛丝马迹，而砖窑厂的工人们却加大力度拼命挖土。

四川大学考古系博士霍巍说：当时这个砖厂的规模很大，每天大概要烧很多砖，具体数量我也不知道，反正老百姓在那里取土的速度非常快，当时对三星堆遗址还没有像今天这样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划，所以老百姓取土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他们挖土的方法就是先从下边把墙根给挖空，然后上面一踩，整块土就塌下来，所以速度很快。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显丹：我们有点好像是被他们赶着跑，因为我们考古挖掘是从上往下挖，他们砖厂的工人为了方便是从下往上挖，这样他们就很快，但是我们必须从上一点点做下去，这样就像我们被他们赶着在跑。

当时，一个埋藏着众多罕见器物的地点和霍巍的小组正渐渐缩短着距离。



四川大学考古系博士霍巍说：一区是李勇宪，二区就是我，三区是陈德安和陈显丹，林向教授全面负责，当时我在二区这个位置，距离后来出土一号坑、二号坑的出土地点特别近，而且我们当时分区的时候，就分在二区。

一个巨大的秘密已经是触手可及了。

那个埋有宝藏的隐型坐标离霍巍小组的探方仅相差十几米。在潮湿闷热的地带已经苦熬了30天的考古队，距离一件巨大的发现仅差几步之遥。当天傍晚，仿佛是鬼使神差，第二区的考古者们宣布发掘工作暂告结束。

1986年7月18日这天下午，砖厂工人一个惯常的动作突然改变了考古发掘的全部节奏。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显丹说：我们当时在那里整理这一年的挖掘材料和资料，有一天下午，一个民工就到我们这儿说，又挖到了几件玉器，但被民工哄抢了。

四川大学考古系博士霍巍说：这次出的东西比较多，老百姓说有一簸箕。听到这个消息，我们觉得数量很大，我们当时很快赶到现场，说来也巧，当时出土的一号祭祀坑离工作站很近，大概几分钟我们就过去了，东西却被老百姓都拿走了，我感觉情况已经比较复杂了，就站在台上向老百姓讲：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文物，大家都知道，如果在下午5点以前，大家把拿走的东西一件不落都交回来，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说了，如果5点以后，这个东西还在你手上，你就算盗窃国家文物，提到了这么一个高度进行宣传。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拿着那些拿走的东西，络绎不绝的就来还了，我们就放了一个撮箕在那个地方，一件一件，果然到最后就那么一簸箕，到下午5点以前，照理说我们估计上午被拿走的东西差不多都回来了，这里面有一个小细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说明当时三星堆的老百姓觉悟还是比较高，听我们讲了以后，基本上都能够把这个东西主动还回来，当时，有一件玉璋，大概挖出来时，就缺掉一个角，这个角和玉璋本体是分开了，玉璋是已经回来了，但是那个角，我们估计可能很难回来了，结果在下午5点以前，最后那个被拿走的小角，也给送回来了，我们把它拼到那个玉璋上面一看，正好，一件不差，差不多都回来了。

一个宝藏的门显现出来，但谜底是什么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显丹说：我们当时判断以为是一个大墓，像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样，因为它有几个“道”，除了主要的坑以外，中间有一条道，然后两边也有坑道，当时，我们估计可能是一个古蜀王的陵墓，当时，我们很是兴奋，挖了这么久，从20年代晚期发掘三星堆遗址以来，从来没有找到这样一个陵墓。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一号祭祀坑。

7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陈显丹先生和几名助手正在现场值班，他们的发掘工作并未停止，而围观的人们已经坚持不住，回家睡觉去了。现场显得非常安静，许多种昆虫在这时仿佛沉寂了片刻。在现场，有一个细节引起陈显丹的警觉，当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件东西。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显丹说：那天晚上就打开了这个宝库的大门，在2:30分的时候，我们就挑出了在灯光底下一点点发光的东西，上面有一些花纹，这些花纹是一条鱼，当时一看是黄金的，我以为就是一条金鱼，接着我就用竹签慢慢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越挑越长后来弯弯曲曲的就出来了，有一米多长，我们就不敢往下做了，为了安全，我们兵分三路，我坚守现场，陈德安立刻返回成都，把这个重要信息通知单位，我们另一路人派了一名学生，立刻到广汉市委书记的家，报告这个重要的事情，请求他们派警察或公安部门的人来。

当夜，四川省考古所的赵殿增先生听到了敲门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殿增说：当时那会儿我还是单位的主任，陈德安就是晚上敲我的门，开门第一句话就说重大发现，跟真人那么大的铜人头，而且还有一个金拐杖，金灿灿的，我们赶紧给它盖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显丹说：到快天亮5点多的时候，广汉市就派了一个排的36名武警，把这个地方围起来，等他们一到我们就宣布这一重大发现，我当时不知道这是金杖，因为刚刚开始发现以为那是腰带，上面刻有鱼和鸟纹，这是我们当时初步的认识，接着又发现了很多玉器，还有石头的，铜头像，还有铜人，当时为了周围的安全，当地的公安部门就把三星堆周围有前科的有犯罪嫌疑的人都清理了一下，该管理起来的都管理起来了。

考古者从坑底清理出众多器物。奇怪的是，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牛、水牛、羊、山羊、蚌壳以及人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

当人们看到一号坑出土的众多器物时，空气仿佛凝固了。

1986年8月14日傍晚，一件令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又发生了。砖厂工人在距离一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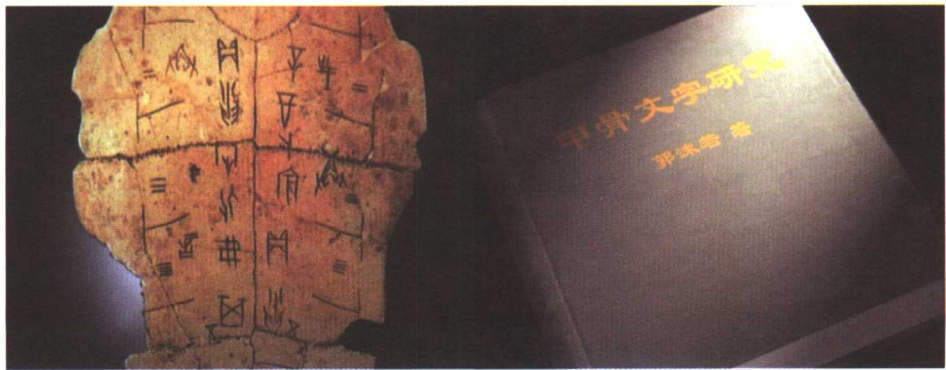
坑30米的地方挖土时，一个埋藏着宝藏的地点暴露出来。考古者迅即赶到。这一年，在广汉的天空下，三星堆的两个神秘之门悄然洞开。

经过7天的准备工作，考古队于8月27日下午对二号坑开始发掘。

第二天，也就是1986年8月28日，与三星堆同纬度的埃及开罗，一场举世瞩目的勘探活动宣布开始。这次勘探的目的是为了发现胡夫金字塔真正的通道。法国建筑设计师多尔米庸和古瓦丹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设想，那就是：胡夫金子塔入口的门洞上为什么要用四块巨型门楣组合成尖锥状顶，然后再用两块巨石保护起来呢？这个大结构实际上掩盖了另一个入口，那个入口在法老死后便被封死了。法国小组采用重力测定技术进行研究，首次了解了古埃及人的建筑秘密。



当法国的考古小组在胡夫金字塔里忍受闷热的时候，在相同时间、相同纬度的另一端，中国的考古者揭示着古人封存的秘密。他们凭借娴熟的手工技术一层一层地拨开坚硬的表土。52年前，第一次接触三星堆考古的人也许曾经脚踏过这里。那时，葛维汉、林名均在燕家院子藏有玉石器的坑旁又发掘出一些玉石器和陶器残片。这些器物对研究西南的古代历史具有深远的意义。那时，林名均教授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旅居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在日本千叶县刚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一书，这是他为了探讨古代社会而进行古文字研究的第一部



著作。通过对甲骨文的考释，阐述了殷代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郭沫若接到林名均先生寄去的照片和说明后回了一封信。他认为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与华北、华中出土的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文化接触的证明。他又说，“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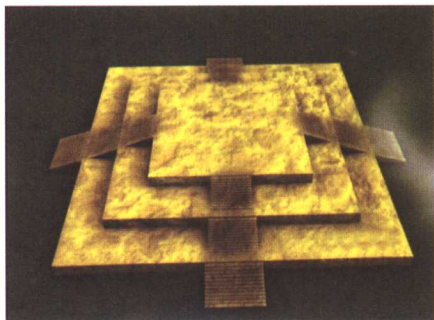
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早在夏、商时期，蜀和中原王朝就有交往。甲骨文记载，商王朝征战时，曾向蜀国抽调过 300 名弓箭手；商武丁时期，商王曾征调军队讨伐蜀国。甲骨文中出现过许多有关蜀的记录。蜀的历史、外交大多湮没在华夏族的历史记忆中，仅在后代的传说记载中略见片言只语。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只不过是邦外之长。到了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的记载。

有关甲骨文中蜀的疆域范围，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郭沫若先生认为蜀乃殷北之敌。胡厚宣先生认为泰安南至汶上，都是蜀的疆土。董作宾先生认为现在的陕西或四川的地域是当时蜀的范围。

先秦的蜀国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单一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分别由蚕丛、柏灌、鱼凫、杜宇（蒲泽）、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统治。

到了开明九世，开始建造都城成都。在今成都市北门外驷马桥以北 1 公里处，曾经有一座高 10 米、直径 140 米的土丘，那便是羊子山土台遗迹。羊子山土台大约始建于商末周初。开明九世之所以在成都建都，可能与这座土台有关系。羊子山土台夯土总量估计在 7 万立方米以上，土砖用量总数在 137 万块以上。建造如此庞大的高台，



其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也许可以从其他方面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使人们和三星堆联系到了一起。三星堆的建造年代比羊子山土台更早。其方向被后人测定为北偏西约 45° 。引人注意的是，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也是北偏西 45° 。而考古者在 1986 年发掘的两个器物坑的方向同样也是北偏西 45° 。这种方向的一致性如果不是巧合的话，那么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妙的信息呢？

对三星堆古代遗存的揭露，使众多器物重见天日。由于这些器物的一大部分带有令人费解的造型含义，古代典籍又缺乏翔实的记录，以至于它们以奇异的姿态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令古今对话的今天一方瞠目结舌。当发掘现场的唏嘘声渐渐落定，人们开始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构建起对话的通道，而这个过程可能非常艰难，也可能相当漫长。